

家国何处：寻找甲午大清战俘(下)

◆ 陈悦

1895年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大战终止时,两国议及战俘交换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在当年夏季完成交接。

8月18日,关押在日本的清军战俘最先被放回。当天早晨6时30分,满载中国战俘的日本商船“丰桥丸”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中国交接委员、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派遣炮舰“镇海”号前往迎接,将被放回的976名战俘从“丰桥丸”接驳送回天津。

1895年8月26日,被关押在海城的568名清军俘虏在城外的甘泉堡被移交给中方代表辽阳州知州徐庆璋,同时被中国俘虏的11名日军士兵交还给日方。

中国战俘刚刚脱离牢笼,很快受到了自己祖国的责罚。按照俘虏不祥的传统观念,饱经折磨重归故土的战俘中,士兵一律就地解散,军官则革除所有官职后遣散。被放回的“操江”舰舰长王永发曾经上书为病死在日本的部下请求抚恤,结果招致清廷严词责骂。在平壤因伤被俘的军官谭清远等,不仅被革职,还被追究被俘的罪责。这些曾为国家付出了鲜血的“不祥之人”很快便从档案中消失。

真田山墓地

从近年发现的明治时代日本档案中获悉,当初交还战俘时,日军还一并移交过记录有人名、籍贯、年龄的完整俘虏名册,以及客死日本的中国战俘的单独名册、诊断书、埋葬记录等重要资料。然而在清政府的档案中,无论是具体办理接收的官员,还是相关的总督巡

抚级大员,在奏报文件中均未提及这些档案。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以及对于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而言,这些名册消失不见,使得一段本可清晰的历史变得疑团重重。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突然得知在日本发现了甲午清军战俘墓地的踪迹,那一刻,我的心情正如同在安徽乡间发现不为人知的北洋海军官兵墓地时一样,是一种看到文字上的历史被现实的存在印证的激动心情。

2010年7月,经过近一年的筹划,以调查在日本的北洋海军舰船遗物为主要目的,我和威海港务局等单位的相关人员来到日本,与在日本的著名撰稿人萨苏先生一起开展范围颇广的地毯式查询活动。期间,2003年被发现的清军战俘墓,也被定为重要的寻访地点。

在大阪被发现的清军战俘墓,位于大阪著名的真田山麓。

并不很高的真田山,因被誉为“日本第一兵”的日本战国时代武将真田幸村进攻大阪城时在该处英勇作战而得名。1871年,日本陆军省在山旁开辟“真田山埋葬地”,即陆军墓地,主要安葬日本陆军系统因公亡故的官兵,至“二战”结束该墓地弃用为止,共安葬了“二战”结束之前各场战斗中死亡日本陆军官兵和军夫,总计建有坟墓5299座以上。同时鲜为人知的是,此处墓地在“二战”中还曾被当做刑场,一些在轰炸日本本土作战中因飞机失事而跳伞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就在这处墓地被处死。

因为距离我们在日本调查活动的宿营城市伊丹最近,真田山的清军战俘墓成为调查的起始。为了

尽量多留出考察时间,也是为了避开正午毒辣的阳光,7月23日一大早,我们就和萨苏会合出发。路过的日本人,在伊丹街头看到这样一行人肯定不会联想到是外国游客,萨苏兄手捧的菊花,使我们看起来更像是要去参加某种祭奠活动。

从伊丹乘JR电车到达大阪时,大阪站内的大型百货商店“友都八喜”正在用标准的普通话广播,大意是中国顾客凭护照可以享受多少折扣优惠,刷银联卡消费又能得到折上折云云,无论是购物的中国旅行团,还是竭力招徕生意的日本店员,估计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这座日本关西重要的繁华城市里,还留着几名百余年前被俘的中国军人的墓地。

时间退回到116年前,1894年的7月23日这天,强行驻扎在朝鲜首都汉城日本军队,在清晨时分攻入朝鲜王宫,俘虏了朝鲜王族,设立傀儡政权,就此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经过真田山上的三光神社,从神社庭院一角拾级而上,很快就能看到在树影掩映中,一片片规模令人心惊的墓地群。这些生前有等级区分的人,死后也并没有得到平等待遇,兵士、夫役的墓地集中在一起,墓碑都是日本旧陆军的方尖碑样式,混凝土材料做成。军官的墓地群则在另外一地,墓碑的体积较士兵的大了许多,材质也完全不同。

经过在墓地里对墓碑进行逐块辨识,一一查找,终于在密密麻麻的日本军人墓之间,寻到了6座中国战俘的墓。

作为这些百余年前中国军人的唯一身份证明的小小墓碑,样式

和周围的日军一样,都是用类似混凝土的材料制成,风化严重的碑体上中国士兵的名字依稀可见,分别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刘汉中、西方诊、李金福。中国战俘墓碑上,姓名之前都有着一处犹如伤疤般的烙印,据说最初刻的是“捕虏”二字,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凿去。

凭着碑体侧面还能依稀看到的被俘地点和当时职务的记载,这6位从中国军队消失了一百多年的军人的身份大致清晰,6人分属于不同的部队,主要在朝鲜和东北战场被俘,在日本期间因疾病等原因去世。据推测,他们当时都被关押在大阪一座名为难波别院的寺庙里。

难波别院的资料中记录,在1895年1月之前,设在该寺的战俘营共羁押了232名中国军人,其中5人病死,大约就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西方诊和李金福。在东北战场被俘的刘汉中因为送至日本的时间较晚,在档案中未有记录。

这6名葬身异国的中国军人中,名叫吕文凤的被俘时间最早,当时甲午战争尚未正式爆发。吕文凤被俘前是中国驻朝鲜首都汉城电报局的一名巡查军官,推测是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领汉城王宫的当天,在日军夺取汉城电报局时被俘虏,而我们到达他的墓前的日子恰是2010年的7月23日。

6人中官职最高的是在东北战场被俘的五品衔骑兵军官刘汉中。根据墓地管理方的记录,这位中国军官在日本临终之际,主动要求日方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详细官职,或许他想有一天凭着这些碑文,能被家人、战友们寻找到。

6人中姓名最奇特的是叫做西方诊的战俘,这个名字明显不是正常的中国人姓名,我们推测他和刘汉中的情况相反,这是一位刻意隐去了自己真实姓名的中国军人。

令人唏嘘的是,6座难友的墓散落在3处,其中5座根据意愿,墓碑都面朝西方,朝着他们永远回不去家的方向。唯有战俘杨永宽的墓背向而立,仿佛表示自己面对临死时身份的羞耻,无颜见江东父老。

我们依次在这些墓前摆上鲜花,拂去蛛尘,默默悼念。萨苏说,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人专门从中国到这里祭奠他们。在完成了对墓碑的逐一拓印、测量,以及绘制墓地布局等基础调查工作后,已经是正午。

当要和这些长眠异国的中国军人告别时,我却感觉怎样也无法挪动脚步。那感觉像是和失散许久的亲人意外相逢,又要立刻分手时的难割难舍,咫尺天涯。紧邻着中国战俘杨永宽的墓,在墓园角落里有个小小的神社,供奉庇护亡者的地藏菩萨。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在神像前合十默念,祈望庇护这些继续留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灵魂得到安息。

在我们完成了在日本九州、本州等地的考察,带着收集的大量资料离去后,过了一个月,萨苏先生和《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娄林伟再度来到这块墓地。娄林伟专门从祖国带了一瓶酒,将家乡的酒祭洒在这些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回不去故乡的中国军人墓前。

(摘自《战争拾遗》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版)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有关程海宝带领年轻演员在这一届大赛上的精彩表演,杂技团团长王建华在《〈十字跳板〉夺金纪事》中写道:“随着明快的旋律,上海杂技团的《十字跳板》在赛场

上亮相了。一组小伙子的‘团团转翻翻’,热烈欢快,先声夺人,一组姑娘们的‘对砸空翻’,如四朵金花,绽开在空中;苏颖的‘三周上高椅’刚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薛颖婕的‘1080旋上三节’又使观众屏息静气。第一次没有成功,场子里的空气凝固了。场上指挥,跳板的核心人物程海宝,和‘1080旋’的表演者薛颖婕、接翻的闻培德的目光自然地交接在一起,这是短暂的一瞬,却闪烁着勇气和必胜的火花。薛颖婕又起翻了,像轻捷的雏燕,在空中利索地完成了‘转体三周’,紧接着一个后提,迅速撤腿,准确、紧凑,无懈可击,闻培德顺着薛颖婕下落的位置,准确地接住了小薛。”

在全国杂技大赛中连续两届夺冠的程海宝,宝刀不老,他的心永远是年轻的。跳板,是上海杂技团的看家节目,他仍然在想着要将跳板砸出新的高度。这个节目,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需要继续传承下去。但是,他要面对的是,《大跳板》的根基虽然难以撼动,观众对它的印象也一直不错,却毕竟是一个经年有加的老节目了。如果不改变“老面孔”,焉能赢得更多人的欢心,保持它在中国杂坛的“王者之相”?

程海宝思绪滚滚,想得更多、更远。是的,是到了应该出新,出奇招的时候了。他和同伴们商量,大家提出了一个方案:改“单跳板”为“十字跳板”,练“1080”提,重树“六节人”,一定要让这个节目焕发青春朝气,威震杂坛。

有了方案,马上行动。一班人马每天清早从家里出发,赶往西郊,在上海马戏学校练功房苦战,失败了,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大家咬定了一个目标,不成功,则不放弃。

苏颖还只有20岁。8年前,她在上海市体工队参加训练。上海杂技团跳板组缺少尖子演员,程海宝到市体工队去挖人才,一走进练功房,他发现有女孩的头翻得特别棒,前扑、小翻、后提、360转体,灵巧自如,更难得的是,小女孩的脸,自信、不服输。

“是块好料啊!”程海宝满心高兴,一眼相中。

2.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全国民间抗日组织在1936年中期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民族矛盾不断尖锐,祖国危在旦夕的必然产物。此前,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解放先锋队、救国协进会、抗日救国会等难以统计,但均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缺乏统一的行动纲领和共同的步骤,因此成立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势在必行。

全救会在上海诞生,也非偶然。上海虽不处于当时抗日前线,但由于它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集聚着大量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勇于担负历史的重任,自觉地投身到抵抗外来侵略的洪流中,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众公认的领袖。同时,在上海他们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日寇人民亲历过一二·八淞沪战争,对日寇的暴行有着切肤的感受;上海日商企业众多,许多华工身心遭到蹂躏。一旦抗日救亡领袖与群众相结合,必然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

1935年末,上海先后出现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1936年初,又出现了各大学教授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在此基础上,于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之际,各方面救亡团体代表和爱国人士在上海总商会礼堂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选沈钧儒为联合会主席,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及其他一些人为执行委员,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5月6日,由上海文化、妇女、职业界、大学教授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联合编辑的救国会机关报《救亡情报》正式发行,发刊词申明:“我们明白各社会分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永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及敌人的走狗——汉奸斗争……我们深望各地方各界的读者,一切不甘做顺民的人们,能炼成钢铁一般的阵线!”这份由九七老人马相伯题写报名的小报,头版还发表了王造时的《认识敌人的目的》和史良的《对准我们的敌阵前进》两篇文章。救国会机关报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海民众自发组织的抗

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成了全救会在上海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救国会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的过程。它的雏形由十二个观点一致、以天下为己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举办的叙餐会形式呈现。救国会创始人之一章乃器在三十一年的隆冬时节里回忆道:“救国会是从一个十人小组开始的,现在记得起姓名的大概是沈钧儒、邹韬

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和我。小组的推动者大概是周新民,而公开召集的是沈老(钧儒)。当时所用的是叙餐会形式,每一二星期叙会一次,下次决定下次会的日期和地点。”

叙餐会——谈和吃的结合,一群爱国文化人相聚,共同的话题自然是国内外形势,日本的霸道、野蛮,祖国的处境,人民的疾苦,统治者的无能。边吃边聊,吃完聊完各自掏腰包付账,绝无吃公款现象。

吃与聊总不免流之空泛,国难当头清谈无济于事,没有固定组织把大家联系起来,形成不了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成了叙餐人士的一大心愿。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他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公开了这一心愿,“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民族生存的问题”“动员全民族大众的集体斗争的力量,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

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每期销数达二十万份,打破了中国杂志界的发行纪录,风行全国,拥有广泛的读者;李公朴创办的《申报》补习学校(后改为育才补习学校)拥有五千青年学生;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在社会上也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知名度、号召力,使他们很快把自己的心愿变为现实。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联合上海文化教育艺术界三百余位知名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主张: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这是整个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